

從契訶夫筆下的女性空間探討 十九世紀末的俄國女性議題*

劉心華**

摘要

空間對於人類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人類生存的背景，更是生存本身。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強調空間不是空洞的概念；它充斥著人工的痕跡，往往被世俗化、結構化，並被刻意地按照社會人群之間的關係佈署。傅柯更將空間拓展到與個體關係的討論。他認為個人與空間有著相互影響的關係，個人在特殊的空間裡被塑造。

在父權制度下，女性往往被男性的空間所束縛，其中包括家庭空間與社會公共空間。由於長期寄居於男性空間下，女性失去了自我的獨立性，依附在男性主宰的世界，她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空間，於是就產生了空間焦慮。

傳統俄國社會的宗法制度將女性禁錮在「閨閣」中，沒有參與男人事物的權利。她們被劃定在家庭裡，承擔所有的勞務：孩子、家務與生計，但是沒有發言權。儘管祖國土地遼闊，俄國女性在本質上是俄羅斯帝國的「他者」，一個局外人。俄羅斯的男人可以享受國家無邊無界的廣大「地理空間」與帝國製造的「權力空間」，而婦女對這樣的地理提供的種種狀況卻一無所知，毫不相干。她們看不到廣闊的家鄉，帝俄時代，被圈在「家庭」的空間裡，到了蘇聯時代之後，則大多被圈在城鎮的生活空間裡，一成不變的工作與生活空間，狹窄、寂寞、無助、缺乏互動。她們被家務、被貧窮、被謀求生計的連續失敗與疲憊壓倒。

* 本文 2010 年 9 月 1 日到稿，2010 年 12 月 9 日審查通過。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副教授。

十九世紀末俄羅斯社會轉型，女性議題浮出檯面，受到許多知識份子的關注與討論。其中亦包括作家契訶夫，他關心俄國女性的內在空間、自我認知與社會身份認同的問題，並在許多作品中反應俄國當時的女性議題討論。本論文擬將空間理論置於契訶夫的小說中加以論證空間與個人的關係，以房間、房屋、內在空間、滯留空間與嚮往城市等面向切入，探究十九世紀末的俄國女性議題。

關鍵詞：空間生產、性別空間、空間焦慮、城市、女性議題

Female Issues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ia in Light of the Chekhov's Theme of Space and It's Role in the Lives of Women*

Shin-hwa Liu**

Abstract

Space is important for human beings; it is not only the background of human existence but the existence itself. Lefebvre's argument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s that space is always secularized, structuralized and organized by social relationships; it is filled with artificial traces rather than an empty concept. Further, Foucault expands spatial theory to the discuss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e thinks individuals and space are mutual influenced. Individual is shaped in certain space.

In patriarchal systems, female are constrained by male space which includes family space and public space. Because having attached to male space for a long time, women lose their independency. Attaching to the male-dominant world, women cannot find their own space so that their spatial anxiety emerges.

Russian society's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system imprisoned women in attic; women had no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male affairs. Women were secluded in houses and shouldered all chores, such as childcare and housework. Although Russia is broad,

* Received: September 1, 2010; Accepted: December 9, 2010.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 Literatur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ussian women were the “others” in Russian empire. Russian men could enjoy the broad geographical space and the imperial power space, but Russian women received no benefit from these advantages. In Russian era, women were secluded in home; in Soviet age, women were secluded in town. They were defeated by housework, poverty, and failure in making living.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Russian society had transformed. Woman issues had emerged and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a lot of intellectuals. Chekhov was one of these intellectuals. He concerned Russian women’s inner space, self-awareness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He also put the discussion of woman issue into his works.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individual in Chekhov’s novels with spatial theory and probing Russian woman issues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oom, house, inner space, stranded space and desire for cities.

Key word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gender space, spatial anxiety, city, woman issue

一、 前言：空間與性別

關於空間與存在的關係，直到法國社會學思想家列斐伏爾（Lefebure）提出《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後，人類對空間的概念才有了根本的改變。他特別提到：「**哪裡有空間，哪裡就有存在**」（Lefebure 1991:22）、「**空間從來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蘊涵著某種意義**」（Lefebure 1991:154）。根據列斐伏爾的這種看法，以往單單從幾何學的角度探討空間，對後現代性的空間詮釋是不夠的；將空間說成是「空洞的空間」概念，只會導致把空間看作是精神性的東西，並依據個人思想去附會其種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空間往往會被世俗化、結構化，並被刻意地按照社會人群之間的關係佈署。這樣一個空間，既具有歷史脈絡的色彩，也充滿了人工的痕跡。

空間生產並非指在空間內部的物質生產（Production in space），而是指空間本身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也就是空間本身的空間產出、社會關係的包容、以及與物質生產的關係。例如，都市建設中的空間規劃與設計，就是最顯著的空間生產現象。

空間是人造的，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純粹形式的，不是理性抽象的，不是一個中性的客觀科學對象，更不是一個物質性的器皿。總之，空間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空間乃是各種利益角逐的產物。它被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澆鑄而成。空間從來不能脫離社會生產和社會實踐過程而保有一個自主的地位，事實上，它是社會的產物，它是真正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汪民安 2007:102）。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空間如同機器一樣，具有使用價值，並能創造剩餘價值；它可以被轉化、交易和消費，例如，公園或河濱，都是被消費的地方。它更是政治工具，「**國家利用空間以確保對地方的控制，嚴格的層級、總體的一致性以及各部份的區隔**」（包亞明 2003:62）。

中世紀的空間顯像完全呼應著農民需求的地貌，與封建主義的生產模式相關。同樣地，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空間顯像是銀行、商業大樓、企業、百貨公司等交織形成的大網絡。社

會主義社會的空間不再顯現資本主義宰制與交換特質的空間系統，而是相關理論的挪用。從空間與社會網絡的相關性來看，「**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表現了各種社會關係，但反過來又作用於這些關係**」(包亞明 2003:55)。另外，傅柯 (Foucault) 更將空間拓展到與個體關係的討論。他認為：個人與空間有著相互影響的關係，空間對人具備一種單向的生產作用，它能夠創造出一個獨特的個體，個人常在特殊的空間裡被塑造。

顯然地，空間對於人類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是人類生存的背景，更是生存本身。由此推演，許多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很早就發現物質性社會實踐會造成性別不平等的男女關係，主要的原因仍在於父權體制 (patriarchy) 的因素。父權體制指的是父親的法律，身為父親的男人施加於妻女的社會控制；而這種社會控制得以達成，是受益於生產關係及空間的支配與壟斷。父權體制所指涉的系統將男人群體建構為優於女人群體，從而假定具有支配女人的權威。在父權制度下，女性被男性的空間所束縛。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 Susan Gilbert 和 Susan Gubar 在《閣樓裡的瘋婦：女性作家與十九世紀文學想像》(*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一書中指出，十九至二十世紀女性文學中，空間形象占有重要的地位，女性常被禁錮於男性的空間內，「房子」就是「女性受監禁的一個重要象徵」(Gilbert & Gubar 1979: 85)。「**她們從父親的房子走出去，然後被嫁到丈夫的房子中，終其一生都在父權的房子中忙碌，遵循著傳統價值觀的要求，扮演『房中天使』，即奉獻者和犧牲者的角色。**」(楊榆、朱潔 2007.09: 121)。由於長期寄居於男性空間下，女性失去了自我的獨立性，依附在男性主宰的世界，她們找不到屬於自己的空間，於是就產生了空間焦慮。實際上，這種焦慮代表著女性對家庭社會束縛的焦慮，更是對其地位與人格喪失的焦慮。

除了家庭，女性也被剝奪了公共空間。Walby 在《理論化父權體制》(*Theorizing Patriarchy*) 一書中指出，先進工業社會中的父權關係，男人以六組結構支配並剝削女人¹。這六組結構

¹ Linda McDowell 在《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Gender, Identity &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1999) 一書中引用 Walby 論述指出，這六組結構是家戶生產 (男人可以將女人不支薪的家務勞動價值據為己有)；受薪工作中的父權關係 (女人被隔離特定職業，獲取較差的報酬)；國家的父權關係 (男人主導制度，並制定帶有性別偏見的法規)；對付女人男性暴力；性慾特質中的父權關係 (男人對女人身體的控制)；以及文化制度裡的父權關係 (男性支配了不同媒體的生產與形式) 以及媒體中的女人再現。

相互關聯，在特殊的環境與地方，形成不同的連結與關係。例如：工業社會的兩種主要性別體制：以私人父權關係為特色的家務性別體制與以公共父權關係主導的公共體制。家務性別體制奠基於家戶生產，這是女人主要工作與活動的地方，除了剝削女性勞動外，更將女性排除於公共空間之外。公共性別體制並非排除女性於公共空間之外，而是奠基於受薪工作與國家結構，以及文化、性欲特質和暴力裡的隔離附屬地位。在家庭形式中，受惠者主要是家中女人的丈夫與父親，然而在公共形式裡，有更多集體的佔用。家庭形式裡的父權策略是排他性的，將女人排除於公共場所之外；公共形式的父權策略則是採取隔離主義和從屬關係，特別是運用工作場域，將女性區隔開來（Walby 1990:6）。因此，性別的區分從來不僅僅抽象地包含在一整套觀念和禮儀系統中，也具體地顯現在現實的空間區隔上。傳統社會所謂的男性和女性，某種程度正是外在／內在、社會／家庭、公共領域／私人領域等劃分中被確立和建構起來的。

二、 俄國的女性空間

一般人對俄國地理的認知，首先映入腦海的，就是領土的廣闊，無邊無際的空間。俄國文化習慣語「心靈愛廣闊」（Душа простор любит）代表著靈魂徜徉在廣闊的天地間，自由自在，毫無拘束。然而，這片廣大與自由的地理空間是屬於俄國男性的，在許多男性作家作品中取得了不可動搖的神聖地位，與民族的神話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民族群體擁有一種神話象徵情結（mythomoteur），而民族則是具有一種共同民族群體和一種廣泛發展的神話象徵情結的實體（Thompson 2000: 10）。在俄羅斯文化中，土地具有女性概念的延伸。「俄羅斯」（Россия）是作為一個女性實體使用的，而非僅代表一個地理的區塊。「俄羅斯母親」（матушка Россия）或「祖國」（родина）已經超越了地理空間的框架，在許多俄國男性作家作品中取得了不可動搖的神聖地位。普希金在其詩作中，不斷地呼喚對俄羅斯祖國的熱愛。在果戈里《死靈魂》第一卷的尾聲裡，乞乞科夫乘著俄式的三頭馬車穿過俄國大平原，這一片平原似乎獲得了神話的地位，馬車突然變形，變成了俄羅斯，並且以瘋狂的速度向前飛奔，奔向一個未知的目的，「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兩邊閃過，其他的民族和國家全都斜視著它，躲到

一旁，給它讓開大路。」(果戈里著，田大畏譯 1999:315)。而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貢獻則在於將俄國風景的描寫轉化成象徵意義，強化了俄國民族神話的意象，其中包括了豐富、神聖或半神聖的地點：戰爭、山崗、麥田、莊園、莫斯科、聖城等，一切都如此莊嚴、神聖。

然而，俄羅斯大地的女性特徵卻不屬於俄國女人。從十五到十七世紀，俄羅斯封建社會不同的階級形成了穩固的宗法制度，女人、小孩和奴僕必須服從家庭中的男主人。女人只能待在「閨閣」(терем)裡，沒有參與男人事物的權利。十六世紀出現了第一部有關宗法生活的規範《治家格言》(Домострой)，漸漸成爲俄羅斯傳統家庭的生活規範。

長久以來，俄國女人的空間被劃定在家庭裡，承擔所有的勞務：孩子、家務與生計，但是沒有發言權。「不要工作(не работать)成爲無法實現的夢想」(Немировская 1997:19)。一般而言，家計的金錢由女人料理。普通家庭的女性，欲望很少，俄國男人是被女人呵護長大的。十九世紀出現了「俄羅斯女人」(русская женщина)的文化成語(культурная идиома)，意味著俄羅斯婦女「強大、忍耐」(могучий, терпеливый)的特殊意涵。

儘管祖國土地遼闊，俄國女性在本質上是俄羅斯帝國的「他者」，一個局外人。除了少數例外，婦女被排除在帝國運行的許多資格稱謂之外。保衛國家和代表帝國的工作是男人的特權，隨特權而來的是權力。俄國男人擁有帝國規則的優先權和福利，而婦女必須承擔爲國家利益，而不是爲個人或家庭的優先權付出代價。(Thompson 2000:200)特別是在俄國，婦女承擔勞務，但是沒有發言權。她們是「失語的強者」。帝國耗盡了俄國男人的精力，而這些精力本來可以用於家庭生活和協助婦女養育子女，料理家務。這種情況造就了俄羅斯性別關係的畸形發展(Thompson 2000:200)。

十九世紀俄國的帝國建造體現在文學文本的敘事中，普希金與萊蒙托夫的作品將婦女侷限在敘事主題的模糊邊緣，她們是以男主角爲中心劇情發展的「陪襯物」。

貝拉淡化出局，讓培喬林和馬克辛·馬克辛米奇繼續完成征服高加索和觀察本地「野蠻人」的任務。塔琪雅娜則變成一位在帝國侵略戰爭中功績卓著的將軍的戰利品妻子。……甚至《戰爭與和平》中的婦女，雖然與眾不同，很有力量，但是依然是拿

破崙戰爭和男人進行改革嘗試的沉默旁觀者。俄國帝國主義的浩大計畫在她們周圍展開，卻不觸及她們。在俄國文學中儘管存在著關於女強人（通常用來對抗所謂多餘人的敘事），在關乎帝國的事物中，婦女卻一向是柔弱的，只為男人的權力欲望效勞（Thompson 2000:200）。

俄羅斯的男人可以享受國家無邊無界的廣大「地理空間」與帝國製造的「權力空間」，而婦女對這樣的地理提供的種種狀況卻一無所知，毫不相干。她們看不到廣闊的家鄉，帝俄時代，被圈在「家庭」的空間裡，到了蘇聯時代之後，則大多被圈在城鎮的生活空間裡，一成不變的工作與生活空間：狹窄、寂寞、無助、缺乏互動。她們被家務、被貧窮、被謀求生計的連續失敗與疲憊壓倒。

三、契訶夫筆下的女性空間——從「阿紐塔」到「娜嘉」的身份尋找

在俄羅斯帝國建構的文本敘事中，鮮少有男性作家關心俄國女性空間的議題。她們是必要的，但對俄羅斯男性而言，她們的存彷彿像空氣一樣理所當然，無以為意。在眾多的俄國男性作家中，十九世紀末的契訶夫可以說是多數中的例外，他關心俄國女性的外在与內在空間。大部分的俄國婦女活在狹隘的世界裡，生活內容極盡貧乏。在 1883 年 4 月 17 到 18 日的一則書信中，他提到在男人與女人的歷史中，女人在各方面都是消極被動的²。他的作品中，女性大多數沒有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追求，只是男性與社會的附庸。她們總是愚蠢、無所事事、重複他人的見解、挖空心思打小算盤、裝模作樣，在無聊與瑣碎的小事裡打轉。

實際上，身體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建構的空間，充滿權力的爭奪。在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轉型中，以包括身體在內的個人生活描寫，尤其是小人物生活的圖像充分表現在契訶夫的小說中，其中亦包含女性議題。以下將從女性與空間（包括地理空間與心理空間）的角度，探討契訶夫作品中的女性議題。

² 轉引自 Babara Heldt, ““Woman Is Everywhere Passive”: Chekhov and the Century's End”,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9.

3.1 失落的房間：女性的空間焦慮

英國女作家維琴尼亞·吳爾芙 (V. Woolf) 在 1929 年的著作《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 中為女性爭取一間自己的「房間」，這間房間不僅代表女性獨立生存的物質基礎與保障，更是她們的自我審視和自我身份認同的精神空間。房屋是屬於父親的、兄長的、丈夫的男性空間，女性則寄居於男性的屋簷下，受他們保護，也受他們禁錮。她們只是男性房子中的點綴，在那裡根本找不到屬於自己的空間。於是她們就產生了空間焦慮症，即對自我空間缺乏的焦慮。這種焦慮實際上是女性對其地位和對社會、家庭束縛的焦慮，更是對獨立人格喪失的焦慮 (楊瑜、朱潔 2007.09:121)。房間作為私人空間對女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是女性心靈棲息的空間，是情感駐足之地。房間給女性安全感與歸屬感，並可釋放自我，宣洩情感。

然而，尋找房間的議題在契訶夫的小說〈阿紐塔〉(Анюта) 中，卻是以極端的方式呈現。故事主角阿紐塔在廉價出租的公寓尋找棲息之所。她先後與六個不同專業的男學生同居了六、七年，扮演著他們的情人、女僕、醫學標本、人體模特兒的角色。她遊走在這些公寓的房間裡，遷來遷去、賺取零頭小錢貼補同居者的生活。她逐漸年老，而每個男人完成學業走向社會後，各各平步青雲，成了上等人。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娶她，因為「**她不夠漂亮，也夠邋遢的，沒個樣子……**」(Т.4, с.343)，「想到了這裡，他 (醫學系學生) 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跟她分手，一刀兩斷，越快越好**」(Т.4, с.343)。

在這篇小說裡，契訶夫用兩個男性 (醫學生與畫家) 的觀點來看阿紐塔。她醜陋、邋遢、卑微、不懂打理、應聲蟲，甚至連日常的清掃也做不好，「**被子揉成一團，枕頭、書本、女衣丟得到處都是，一只骯髒的大盆裡裝滿肥皂水，水面上漂著煙蒂，地板上有些垃圾，一切東西都像是堆在一個地方，故意弄得凌亂不堪、揉成一團似的**」(Т.4, с.340)。

阿紐塔在小說中幾乎是失語狀態，總是默默無言，做房間主人要求她做的事情，趕她出去，又被叫回來，她是妓女，也是被馴服的奴隸。她得了空間焦慮症，尋找一個能棲身的地方，甚至只是一個位置。醫學生心軟要她回來後，「**她嘆了一口氣，不出聲地往她素常的座位那邊，往窗子旁邊的凳子那兒走去**」(Т.4, с.343-344)，空間的喪失也代表阿紐塔自我意識

的喪失。

3.2 空洞的房屋：女性主體的喪失

契訶夫在 1899 所寫的〈寶貝兒〉(Душечка) 卻是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女主角奧蓮卡(Оленька) 擁有房屋，卻不斷地尋找填補房屋的空洞。奧蓮卡總是把與她相戀、結婚的男子的見解當成自己的見解，她全心全意的愛，完全忘了自己。愛上戲劇經理，便認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戲劇；愛上木材商人，生活重心變成了木材買賣；愛上了獸醫，生活又充滿了家禽健康。最後，她又將一切移情到獸醫的兒子，發揮女人的母性。命運似乎與她作對，不斷地讓她痛失所愛，成為寡婦。

契訶夫是以幽默、滑稽的手法描寫奧蓮卡。她反覆著同樣模式的愛情，而且每次有新的戀情發展，就把前面的愛人忘得一乾二淨。每件愛情間的空檔雖有短暫的悲哀，卻引不起讀者的同情。

房屋代表的只是空洞的外殼，奧蓮卡完全失去了「自我」，不斷尋找男性「他者」來佔據房屋的空間。她的內心就像房子一樣空洞，連做夢也夢見家裡的「空院子」(т.10, с.109)。

頂糟糕的是，她什麼見解都沒有了。她看見周圍的事物，也明白周圍發生了什麼事，可是對那些事物沒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不知該說什麼好。沒有任何見解，是多麼可怕啊！比方說，她看見一個瓶子，看見天在下雨，或者看見一個鄉下人坐著大車走過，可是她說不出那瓶子、那雨、那鄉下人為什麼存在，有什麼意義，哪怕拿一千盧布給她，她也什麼都說不出來。當初跟庫金(Кукин) 或普斯托瓦洛夫(Пустовалов) 在一塊兒，後來跟獸醫在一起的時候，奧蓮卡樣樣事情都解釋，隨便什麼事她都說得出自己的見解，可是現在，她的腦子裡和她的心理，就跟那個院子一樣空空洞洞。生活變得又可怕又苦澀，彷彿嚼苦艾一樣(т.10, с.109-110)。

契訶夫在這篇小說中戲謔地諷刺了女性神聖的愛情，突顯只為愛情而活女性的荒謬和沒

有主見的可怕。然而同時代的俄國作家，反對女性解放的托爾斯泰，讀完這篇作品卻非常感動；他認為，

看到作者描寫奧蓮卡對庫金和他的事業，對木商、對獸醫所付出的熱愛和全心全意的忠誠，我感動了；看到作者描寫她孤苦伶仃、沒人呵護時的難過，我更加地感動了；看到作者描寫她如何竭盡女性、母性的情感（雖然她一生並沒有做過母親）力量，懷著無比的熱愛，去照顧那未來將成為男子的、帶著大制帽的小學生時，我也一樣感動了（契訶夫著，鄭清文譯 1987：159）。

年齡相差 32 歲的兩位作家，對待女性議題自然有著不同時代背景的觀點，兩者看法之差異凸顯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轉型下的女性議題。

3.3 貧乏的內在空間：女性的庸俗化

由於空間塑造性格與俄國社會性別的畸型發展等因素，俄國傳統女性內在長期呈現空洞化、庸俗化。契訶夫在許多作品中呈現女性內心貧乏、無知的可怕。在〈愛情〉（Любовь）中，敘述者「我」的未婚妻薩夏（Саша）是個「一切正派男人愛慕的美人」（т.5, с.86），但什麼也不懂，連寫一封信也錯誤百出，沒有標點符號。未婚妻薩夏每天忙於無意義的事，連兩人獨處時刻，也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完全聽不進未婚夫的未來計畫。她極關心的問題是未來兩人的房間在哪兒？房間糊什麼紙？或檢查未婚夫桌上的小物件，瞧瞧紙片上寫些什麼？聞聞香水瓶等等。若問她有什麼書，她會說「各式各樣的都有」（т.5, с.89）；若問她有些什麼樣的思想、信念、目標，她想必也會同樣說，「各式各樣的都有」（т.5, с.89）。

敘述者「我」說道，每次到未婚妻家裡老是碰上他們全家上上下下忙於做愚蠢的嫁妝，屋子到處散落著熨斗、硬脂、煤氣味，薩夏探頭探腦，穿梭期間，做不了什麼事，或者又忙著與母親前去商場買東西，講價錢，極力把價錢殺得「低而又低」（minimum）（т.5, с.90）。未婚夫建議薩夏該讀點東西，只見

她就拿起一本書，在我的對面坐下，開始蠕動她的嘴唇。我瞧著她小小的額頭和不住蠕動的嘴唇，不由得沉思起來。「她就要滿二十歲了...我想如果把她和一個有知識的同年齡男孩相比，區別是多麼大啊！男孩子就又有學識，又有信念，又有頭腦(т.5, с.91)。

薩夏是典型被禁錮在家中等待出嫁的俄國一般女性。十九世紀俄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 В.Г.)曾以人道主義的立場對當時俄國婦女的社會角色進行批判。別林斯基關於女性問題的觀點，見諸於他的論著《亞歷山大·普希金作品》。這部論著由十一篇文章組成，從1845~1846年陸續發表於《祖國紀事》上。在《亞歷山大·普希金作品》的第九篇《葉甫蓋尼·奧涅金(續)》(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окончание))中別林斯基深入地討論了俄國當時所面臨的女性問題。他認為相對於男性主導的社會地位，俄國女性連次等角色的地位也沒有。

十九世紀的俄國社會，女性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一種是待嫁閨女，另外一種是已出嫁的婦人。俄國少女不是歐洲社會意義上所謂的女人，她不是一個人，她不過是一個未婚妻罷了。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把所有在家裡看到的男人都叫做自己的未婚夫。她周圍所有的人都告訴她說，她是新娘子，從幼年起，到青年，甚至一直到老，她的一切思想、一切夢想、一切渴望，甚至於一切祈禱都集中在出嫁上面。從十八歲起，她開始覺得她已不是父母的女兒，不是她們的掌上明珠，而是一個沈重的負擔，一件即將沒有銷路的貨物，一件即將跌價且難以脫手的多餘傢俱。因此，除了學會了勾引未婚夫的一套本領外，什麼都不會，而俄國男人對待女人如同一件物品、商品，是從功利主義出發的。

她是生利息的資本，一座村莊，一棟有進帳的房屋；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她是你的女廚子，洗衣婦，管家婆，嫗姆，要是能升到做你的婢妾，就算是了不起了(Белинский,1976:404)。

性別角色的實現常伴隨社會化過程而展開，社會化的實質就是「角色扮演」，也就是學

習領會他人的期待，並按照這種期待從事角色行爲。其最終目的即是「客我」的完成。具體地來說，社會化是一個人從「生物人」向「社會人」轉變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內化社會的價值標準，學習角色技能，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鄭杭生，2003：184）。問題的關鍵存在於俄國少女所內化的「社會價值標準」，所學習的角色技能中，存在著社會的性別歧視與偏見。因此，隨著對性別角色內化的完成，她們便在意識中開始對社會價值的全面認同。她們是待嫁者，是被觀察的物品，長期以來逐漸失去了女性獨立的人格，而成爲俄國女性的集體「失語」狀態（傅璇，2004：44）。這種缺乏獨立的人格與失語狀態爲沒有愛情的婚姻提供了溫床，等到完成婚姻儀式後，已嫁的婦女獲得了期待已久的「主婦」的地位，開始當起了少奶奶；指揮家裡上上下下所有的人，包括控制自己的丈夫，表面上成了自己的「主人」。而事實上，在出嫁前什麼也不學，什麼也不管，完全不懂得如何打理家務。因此，婚後的生活充斥著無序、庸俗的品質。她們是她們母親的翻版，也是她們母親的母親的翻版，同樣地，她們又爲自己的女兒設立了唯一的目標——成爲未婚妻。這種畸形的發展，致使俄國女性庸俗化。

在契訶夫的許多作品中，如《跳來跳去的女人》、《掛在脖子上的安娜》，都代表了這些內心貧乏、膚淺的異化女性。

3.4 滯留在空間的女性——被馴服的奴隸

自別林斯基之後，俄國評論家廣泛地討論女性議題，也就是長久以來女性解放問題，她們在社會中被壓迫的問題。杜布羅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³、彼薩列夫（Писарев）⁴、車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⁵等人都曾討論過這個議題，並反應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在這個思想轉變的時代，文學作品和俄國的真實生活相互影響。正如同契訶夫所言，「**新的生活形式隨著新的文學形式改變，它們經常與人的保守精神相違背**」（В. Сахаров 1999）。最好的例子就是車尼雪夫斯基的《該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這本書對俄國社會影響極大，除

³ Добролюбов, Н. (1836-1861), 俄國文學批評家、政論家、革命民主派人士。

⁴ Писарев, Д. (1840-1868), 俄國文學批評家、政論家、革命民主派人士。

⁵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1828-1889), 俄國烏托邦哲學家、文學批評家、政論家、革命民主派人士、作家。

了促成了「新女性」形象的誕生，還深刻地剖析了俄國社會的女性問題。

車尼雪夫斯基的小說在當時可說是俄國青年的啓示，尤其受到女性知識份子的歡迎。她們渴望自由，希望像書中女主角薇拉·帕夫洛夫娜（Вера Павловна）一樣逃離家庭，嫁給愛人，甚至同居也好，一起浪跡天涯，共創未來。1890年代，男人對女人而言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愛人、未婚夫和丈夫，而是爲了同樣目標而努力的戰友，帶著自己心愛的女人向光明目標前進的人。這些進步女性渴望在心愛男人身上看到自己所缺乏的信心與自我，她們準備好與心儀的男人爲未來去奮鬥。然而，她們這種要求的愛情對男性來說像是一場嚴厲的考驗，並非每個俄羅斯的男子認同這種認知與期許。

契訶夫在作品中也觸及當時的女性議題，令許多讀者與評論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在這位藉由幽默諷刺性文章和短篇小說聞名的作家作品中卻看到了新女性，及其從來不直接說明的獨特見解。

在契訶夫的作品中可以發現一些處在時代變動的進步女性，她們等待心儀男人的解放，帶她們離開自己停滯的空間，期待自己徹底的改變，然而，如同彼薩列夫所言，「**在男女關係間，多少滲入令人苦惱的官僚主義，充滿在我們個人與社會生活之中。**」（В. Сахаров 1999），這些女性通常只有失望地停留在原地。〈某小姐的故事〉（Рассказ госпожи NN）中的「我」回憶，當荳蔻年華時，是自由健康、門第高貴的富家小姐，被周圍的人圍繞與寵愛，其中包括深愛她的法院代理偵訊官彼得·謝爾蓋依奇（Пётр Сергеевич）。但是，兩人貧富與社會地位相距懸殊，彼此之間隔著一道牆，「**我們兩人都認為這堵牆很高很厚**」（т.6, с.452）。

在城裡，他到我們家裡來，總是帶著勉強的笑容批評上層社會，遇到客廳裡有外人在座，他總是拉長了臉，保持沉默。沒有一堵牆是打不破的，然而現代戀愛中的男主角，就我所知道的來說，都太膽怯、怕事、懶散、多疑，很快就安於一種想法：他們都是失意者，他們的生活欺騙了他們；他們鬥爭，只限於批評，說這個世界庸俗，卻忘了他們的批評本身也漸漸變成一種庸俗的現象（т.6, с.452）。

契訶夫作品描寫了許多這類無力的男性，懦弱、好批評卻什麼也做不了。爾後，男女主

角都變老了，所有的美好回憶很快地煙消雲散，雙方對生活不再有激情，有生命，變得病懨懨的；女主角已不再想到門第高貴，家庭富裕的距離了。她期望男主角最後有所行動，

我大聲哭泣，雙手按著太陽穴，嘴裡叨念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生活毀掉了……」。可是他坐在那兒，一聲不響，……我從他的眼睛裡看出他憐惜我。我也憐惜他，而且暗自氣惱這個膽怯的失意者，怪他沒有能夠為自己，也沒為我建立美好的生活」（т.6, с.453）。

女主角的盼望終究落空，生命就像壁爐裡的火星餘燼，漸漸熄滅了。

另一篇小說〈帶哈巴狗的女人〉(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的情形也是一樣，男女主角同樣地無法擺脫現實的環境，深陷必須躲藏、欺騙、分居兩地，久久不能見面之苦，而未來解決之路還很遙遠。

《凡尼亞舅舅》(Дядя Ваня) 中的索尼亞 (Соня) 始終無法離開無趣的莊園；《三姊妹》(Три сестры) 的姊妹奧利加 (Ольга)、瑪莎 (Маша)、伊琳娜 (Ирина) 終生嚮往莫斯科，企圖擺脫鄉下灰暗的生活，卻終究無法成行，實現願望。她們都被困在原地，滯留不前，期待被心愛的男人拯救，帶著她們向光明目標邁進；然而，大部分的男性就像同時代作家岡察洛夫 (И.Гончаров) 小說中的人物奧柏拉莫夫 (Обломов) 一樣，只有空談，沒有行動。

3.5 嚮往城市——女性的逃離與重生

契訶夫的旅行隨筆〈來自西伯利亞〉(Из Сибири) 中談到西伯利亞的女人，「就像西伯利亞的風景一樣無趣，她們沒有生氣、很冷漠、沒什麼品味、不唱歌、不會笑……。若西伯利亞出現小說家、詩人，在他們的作品中女性將不會是主角，她不會鼓舞、引起崇高的活動，不會拯救，不會走到天涯海角」(Чехов, А. 1890)。作者用一種諷刺的手法描寫鄉村的單調、無趣、貧乏的生活，並強調環境對塑造人的重要性。那麼女性的出路究竟在何處？

契訶夫在 1897 年的小說〈在故鄉〉(В родном углу) 與 1903 年的小說〈未婚妻〉(Невеста)

中的兩位女主角薇拉 (Вера) 與娜嘉 (Надя) 都厭倦鄉村莊園生活的單調、粗俗、無所事事、游手好閒、毫無變化，然而，兩人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在故鄉〉中的薇拉從城市回到鄉下，她在貴族女子中學畢業，會說三種外語，讀很多書，與父親一塊遊歷過。可是到頭來卻得在一個荒僻的草原莊園定居下來。她從城市回到鄉下後，「成天無所事事，從花園走到田野，再從田野走到花園，然後就在房子裡坐著，聽爺爺喘氣嗎？可是說該怎麼辦？躲到哪裡去呢？」(т.9, c.316)。無邊無際的原野，單調而沒有人煙，使她害怕，好像「這個安靜的綠色怪誤會吞噬她的生命」(т.9, c.316)。而當地的人對所有的事物都是漠不關心，無所用心。「好像他們既沒有祖國，又沒有宗教，對社會也不感興趣。」(т.9, c.319)。薇拉選擇告別幻想，回到真實的生活，她出嫁後，決心準備管理家務，給人治病，教人唸書，過真實的生活，不再期待周遭環境的改變，「不再希望更好的生活」(т.9, c.324)。

對於鄉村莊園文化的衰敗，契訶夫並無任何惋惜與留戀，對待女性議題，他在生平最後一篇小說〈未婚妻〉中給了答案，透露社會轉型中的女性新的生活方向，離開鄉村，前往莫斯科或彼得堡等大城市接受教育。小說中的親戚薩夏 (Саша) 鼓勵娜嘉，離開鄉下傳統封建的家庭與社會，去外面的世界讀書，做個有自我思想和獨立的女性。他對娜嘉說：「要是您去上學就好了！」，「只有受過教育的、崇高的人才有意思，只有他們才合乎需要。」(т.10, c.208)。

新娘娜嘉逃婚，前往莫斯科求學，終於了解她們全家所過的不勞而獲的生活是不乾淨、不道德的，是在吞食別人的生命。她開始厭惡這種生活，決定徹底與舊生活決裂。契訶夫在生命的最後，提供了俄國婦女一個積極的典範，女性終將擺脫「未婚妻」的傳統寄生蟲角色，尋求獨立自主的身份認同。

從這篇小說可以看到空間的流動，從鄉村到城市，也反應了時間的轉變，一個嶄新時代的來臨。廿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化蓬勃發展，文學、繪畫、戲劇、音樂、建築都達到了空前的盛況。社會文化生活紛繁多樣。眾多的藝術思潮、流派和團體組織大放異彩，交相輝映。當時鼎盛的文化主要形成於一些如彼得堡、莫斯科的大型城市。兩地匯集著俄國主要博物館、劇院、美術館與學校；文化界人事與藝術精英都聚集在城市裡居住、求學與工作。城市在契

訶夫的筆下代表著進步與知識，嚮往城市的隱喻不斷在作家的作品中顯現。只是當時的契訶夫卻萬萬沒有預料到，革命後的蘇聯政權卻將女性城市生活空間壓縮得更加狹窄，更加灰暗。

四、結論

契訶夫描繪了俄國舊社會奄奄一息的女性，也傳達了新女性在艱難的過度時代所面臨的挑戰與抉擇。繼契訶夫之後，高爾基的《母親》(Мать)也描繪新女性(1900年代)。時代分界的文學都預言了1860年代民主理想的勝利會培養出一批真正的新女性——新的蘇聯社會建立者。事實上，之後的歷史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阿爾曼德(Инесса Арманд)⁶、柯隆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⁷、蕾絲涅爾(Лариса Рейснер)⁸、薩茨(Нагалья Сац)⁹及其後的追隨者都在等待自己的契訶夫出現。契訶夫鼓勵有理想的女性應對自己的和他人承擔重大責任。他沒有給予新女性形象、外表、服裝，因為她們不需要服裝，也不需要髮型，更不需要迷人的外表；她們必須學會因另一種方式去感受、去思考，避免讓自己感到羞愧。

⁶ Арманд, И. (1874-1920),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員、國際工人與共黨運動活動家。

⁷ Коллонтай, А. (1872-1952), 國際暨俄羅斯革命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布爾什維克政府第一代政要、作家。

⁸ Рейснер, Л. (1895-1926), 女革命家、記者、蘇聯作家。

⁹ Сац, Н. (1903-1993), 蘇聯導演、世界第一位歌劇女導演、兒童劇院創立者、兒童歌劇創立者。

參考文獻

- 包亞明主編 (2003) 《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汪民安 (2005) 《身體、空間與後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McDowell, Linda 著，徐苔玲、王志弘合譯 (2006) 《性別、認同與地方》。台北：群學。
- 果戈里著，田大畏譯 (1999) 《果戈里全集》，第四卷。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
- 鄭杭生 (2003) 《社會學概論新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契訶夫著，鄭清文譯 (1987) 〈托爾斯泰評《可愛的女人》〉，《可愛的女人》。台北：志文出版社。
- 楊瑜、朱潔 (2007.09) 〈開啓女性的生存空間——伍爾夫小說中的「房間」與「窗戶」意象解讀〉，《域外視野》，頁 121-125。
- 傅璇 (2004.06) 〈性別角色的被給定和男性主導——維·格·別林斯基女性主義思想解讀〉，《俄羅斯文藝》，第二期，43-45 頁。
- Gilbert, S. & Gubar, S. (1979)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ldt, Babara. (1992) *Terrible Perfection: Women And Russian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Thompson, Ewa. (2000) *Imperial Knowledg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lonialism*.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 Walby, S.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Woof, Virginia. (1991)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Белинский, В. (1976) Статья девятая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окончание)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шестой*.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Немировская, Ю. (1997) *Русские культурные идиомы*.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1969) *Что делать?*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Чехов, А. (1984)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четвёрт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Чехов, А. (1984)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пят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Чехов, А. (1985)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шесто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Чехов, А. (1985)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девят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Чехов, А. (1986)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десятый*.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Чехов, А. (1978)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Сахаров, В. (1999) Героиня, блудница или покорная раба? Чехов и «женский вопрос». [online] .2005/5/12.
Available: <http://www.ostrovok.de/old/prose/saharov/essay005.htm>
- Чехов, А. (1890) Из Сибири. [online] .2010/4/29.
Available: http://az.lib.ru/c/chehow_a_p/text_0200.shtml